

g u i z h o u k a i f a s h i h u a

秦始皇开五尺道

张仪计取黔中地

孔尚任与黔中蕃

朱元璋的黔中时代

贵州在南宋马市中的地位

G U I Z H O U K A I F A S H I H U A

贵州开发

刘学洙 / 著

LIUXUEZHU

史话

隆与贵州

百年前的兴黔梦

贵州首次留洋热

贵州封疆大吏难当

千里乌江百块碑



秦始皇开五尺道

张仪计取黔中地

孔尚任任中密

朱元璋的黔术

贵州在南宋马市中的崛起

GUINZHOU KALIFASHIHUA

贵州开发

刘学洙/著

LIUXUEZHU

史话

乾隆

千里黔江百块碑

贵州封疆大吏难当

贵州炎热

百黎黔黔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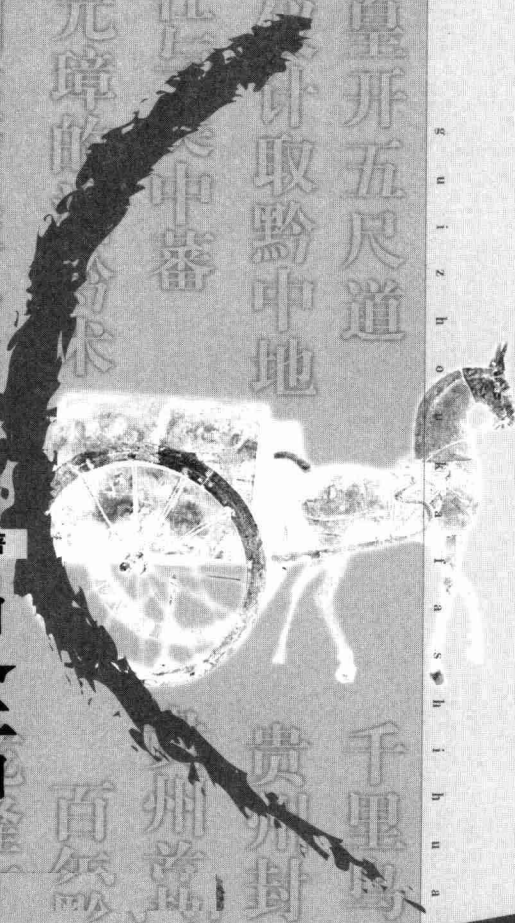
黔

黔

黔

黔

GUINZHOU KALIFASHIHU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贵州开发史话/刘学洙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1.9

ISBN 7-221-05527-0

I. 贵… II. 刘… III. 地区开发 - 历史 - 贵州省
IV. F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3381 号

贵州开发史话

作 者: 刘学洙

责任编辑: 许 明

装帧设计: 曹琼德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1)

经 销: 贵州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贵阳宝莲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110 千

印 张: 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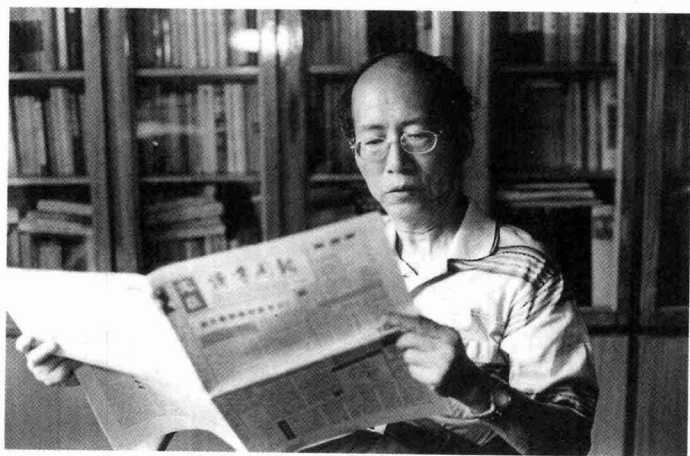
印 数: 0001—1500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21-05527-0/F·281

刘学洙，老报人，高级编辑。1929 年生于福州市。从事新闻工作四十余年。历任《贵州日报》记者、编辑、总编辑、社长、中共贵州省委委员、省政协常委。1998 年退休。曾有《拾碎集》、《热肠冷语》、《刘学洙随笔选》出版。



目录



代序：试从旧史悟新闻——1

张仪计取黔中地——6

秦始皇开五尺道——10

枸酱引出夜郎道——13

司马相如与公孙弘的争论——17

附录：穿越贵州的历史时空——21

惟尔贵州远在要荒——31

贵州沿革与贵州文化——35



朱元璋的治黔术——40

奢香智除马阎王——44

贵州建省与首任“省长”——48

撤省之争——51

明清贵州：血与火的洗礼——55

重兵镇黔疆——58

贵州封疆大吏难当——62

社会进步的沉重代价——65

乾隆与贵州——69

乾隆处决贵州两任巡抚——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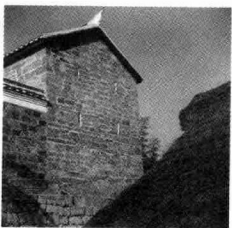
敢为贵州说话的大官——77

目录

贵州在南宋马市中崛起——	81
明代屯田使贵州“两项翻番”——	86
围绕开发矿产的一场争论——	90
封闭的山门初次打开——	95
潮起潮落话青溪——	99
胎死腹中的清末贵州铁路——	104
百年前的兴黔梦——	107
军阀与贵州经济——	113
抗战时期贵州经济纵横谈——	118



尹珍故里的沉思——	123
席书不避谪臣王阳明——	129
孔尚任与吴中蕃——	133
从尹珍到李端棻——	138
傲骨棱棱谁得见——	142
贵州首次留洋热——	147



千里乌江百块碑——	150
圣泉，历史的诉说——	160
后记——	169
参考书目——	171



代序：试从旧史悟新闻

《贵州开发史话》预先未有成套计划，东一篇，西一篇，一事一叙，竟写了30篇，曾连载数月，占据贵州日报《周末》专刊不少宝贵版面。这次结集出版，作了个别文字修订，并增补几篇有关文化随笔。现在呈献给读者朋友。

(一)

这些年，笔者涉猎贵州历史，有个问题萦回于胸，每想探其究竟，这便是历代中央王朝对贵州的看法与态度。前年，在贵州省史学会与世纪中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联手组织的《贵州，历史告诉未来》丛书编委会上，我曾建议，可以研究一下历代中央王朝的“贵州观”及其治黔方略。编委会采纳了这个建议，在丛书的选题计划中，列入了一个题目：《功过漫评说——明清治黔者选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研究贵州历史，吸取历史经验，固然要着重研究贵州政治沿革、社会结构、经济、文化、民族关系、历史人物等等；同时还应当很好研究贵州与外界的关系，尤其是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从中央王朝的大视角反观贵州，把贵州放在大一统的祖国全局中加以考察，许多问题可能会看得更清楚。已故著名历史学家方国瑜先生在《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一书弁言中写到：“研究西南地区的问题，必须把它提到全国范围之内来考虑，因为自古以来这个地区是伟大祖国版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政区设置的地名以及几次大的改变，都是与全国整体形势息息相关的；如果离开全国形势，孤立的谈论这个地区的问题，必然谈不清楚，

也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意见。

贵州在全国的地位,是经过漫长历史不断发展变化的。我们常感到,贵州在历代中央王朝的心目中往往不占重要位置。贵州之被外界忽视,其源久远。这恐怕与贵州所处的历史地理区位有关,也与全国大局整体形势有关。不管贵州人自我感觉怎么样,夜郎自大也好,夜郎自小也好,其种种民族心理都是历史情势长期积淀形成。中央王朝对贵州是重视还是忽视,是强化统治还是弱化羁縻,是开发经营还是放任冷落,也均非出于统治者的主观意愿,而是不同历史阶段全国大势所决定。在我写《史话》过程中,涉及这类问题不少。历代中央王朝总是在它全盘战略需要的时候,才想到贵州。汉武帝因为要征服南越(今两广一带),才派唐蒙入黔修夜郎道;唐朝由于南诏进犯贵州,威胁巴蜀,才招募山西人杨端来收复播州,开创对今遵义市辖区七百年的经营史;元代加强对全国的控管,才在贵州开驿道,设站赤(驿传的蒙译),为贵州经济发展创造了一点有利条件;明太祖朱元璋很清楚,欲巩固云南,必先安贵州,才派20万大军驻黔,遍设卫所,建立屯田制。明朝廷看到了贵州在西南举足轻重的地位,乃导致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的建立贵州行省。许许多多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当中央大棋局中有贵州位置时,当贵州与外界有较多联系的时候,贵州就会有较大的发展。反之,则停滞、落后,游离于中原主流文化之外。这一条历史经验,很值得我们正视与记取。

贵州作为我们伟大祖国一个组成部分,与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贵州的开发史,是中原文化与贵州本土文化交汇融合的历史。贵州山国,地处西南奥区,长久与中心地区山川阻隔,交通不便,开发贵州较之那些条件优越的发达地区,百倍艰难。这也铸造了贵州人特别坚毅顽强的精神。有人以“山骨”形容贵州文化。

山之骨亦黔之骨。山之骨,是贵州人的文化性格。世居万山丛中的贵州各族人民,并不拒绝外来文化。他们常常敞开胸怀,接纳中原文化、巴蜀文化、江南文化、荆楚文化,虚心学习外来的先进生产技术和优秀文化传统。一代一代汉族与其他民族的移民,融入贵州社会,与本土人民共同奋斗,推动了贵州社会进步,形成了特别鲜明的“多元一体”贵州文化。这个历史长卷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生动的画面。因此,在研究贵州开发史中,围绕中央王朝与贵州地方的关系,不能不触及许多更深层面的问题,比如中原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政治统治与经济开发的关系;历史上有哪些是真正意义上的开发;在贵州历史进程中,尤其从明清至近代,有哪些突破,又错过哪些失之交臂的机遇;孕育着哪些发展的可能性,又夭折了哪些机会的萌芽;在近代历史中,贵州为何在全国大舞台中也曾初露风采,又如潮汐般起而复落;种种历史经验教训,都发人深思。

(二)

笔者一介报人,忽对历史发生兴趣,从采访今天,退而采访昨天;从关注新闻,转而钟爱旧闻,有人说我转了业,我说还是老本行。历史是昨日之新闻,新闻则是明日之历史,新闻与历史是共通的。采写新闻应有历史眼光,研究历史应有现实针对性。范长江的成名作《中国西北角》,是新闻巨构,其实也是历史随笔,文化随笔,是极具历史深厚感之新闻。司马迁的《史记》是史书,其中许多人物、事件的描写,实是最精彩的通讯报道,具有历久弥新的现实启迪性。这些前贤,自非我辈所能企及万一,但应当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笔者对贵州历史知之甚少,退休后稍有涉猎,顿觉相识恨晚。半路出家,再想从头学起,年龄已不饶人。只能在漫游志林史海之际,偶有所得,辄欣然命笔,从史

志中撷取典型个案,东鳞西爪,试作些梳理与思索,一事一叙,算是门外汉的“门外史谈”,旧闻新录而已。出自记者的职业习惯,用点新闻笔法,希望便于大众传播,未敢有何总体构想也。之所以采用《贵州开发史话》这个名称,是受西部大开发的鼓舞。我想,研究贵州历史,也许对深化省情认识,思考今日开发,不无裨益吧。

历史是一面镜子,而新闻也是一面镜子。拿历史这面镜子观照今日,又以新闻这面镜子证之旧史,自然会有这样那样的感想。其实,任何人写历史或读历史,总是会加入自己的理解。对于已经逝去的历史以及被前人书写下形成文本的“历史”,不同时代不同视角的人,见仁见智,都会有不同的理解。一位历史学家说:每次书写都是一次历史记忆的发掘,每次历史回忆都是重新理解,都是今人古人之间的无尽的对话。我想,这也是今人与今人之间,借古人而进行的无尽对话。那么,从贵州历史中,能够作哪些对今天有所启迪的对话呢?现在回过头看,这些《史话》大概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这样一些问题:一、从秦汉开发西南夷,到近现代对西部的开发,历史穿越二千年时间隧道,开辟贵州这个西南大通道,一直是事关全局的主题。二、贵州政治沿革与贵州文化发展的关系。明之前贵州郡国纷立,分合无定;地方政权兴替与中央王朝改朝换代并不同步;历史上的贵州疆域,与今之贵州疆域不等同。上述特点,带来贵州文化、贵州开发与中原不同的差异性。三、中央王朝治黔方略与民族政策的历史思考。明清贵州战乱频仍,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贵州社会获得了长足进步,也为这个历史进程付出了沉重代价。四、开放与开发的关系。南宋马市使贵州卷入全国市场;明代屯田制使贵州耕地与劳力双翻番;移民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结合;西方资本输出刺激贵州封闭山区商品生产等等。五、西学东渐打破贵州高原千年沉寂,出现了初始的兴黔潮。六、贵州封疆大吏治

黔功过评说。许多史实说明，在贵州这样的边远落后的多民族地区，为官施政更要从省情出发，敢为贵州说话，结合实际执行王朝政令。如此要求封建时代官吏可能太苛，但历史上也并非没有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七、贵州教育与贵州开发。以尹珍、王阳明、李端棻三贤为代表，看贵州民智开发从儒家王化教育到以人为本的近现代启蒙教育转变的不同历史阶段……上面这些问题，有的只是把问题提出，有的还浮在历史的表面，并未形成理性认识。此外更有许多关于贵州开发史的重要问题，未能涉及，相信会有更多高明之见将以教我。

际此《史话》结集付梓之时，我想起邓拓 1962 年有诗赠当时北京日报社长范瑾女上云：“试从旧史悟新闻，列国春秋岂可分？东观惠姬文字乐，莫论世事乱纷纷。”这是中国不朽新闻家邓拓对范瑾及新闻界的期盼。惠姬即班固之妹，名班昭。班固修《汉书》未完成，惠姬在东观藏书阁续完。诗用此典，把范瑾办报比为修史文字之乐，寓意深刻。今日之中国，早已非当年可比。人们拓展解放思想、理性思考的无比广阔空间，读史乐，“试从旧史悟新闻”尤乐。因借邓拓诗句，作为代序的题目，盖揭示一种追求也。

张仪计取黔中地

从古代中央王朝的视角来看，贵州实在太遥远。当我们的华夏祖先在黄河长江流域热闹异常地演出一幕一幕政治军事争雄的活剧时，贵州这块远离主流文化中心的遐荒，还静静地躲在万山丛中，过着一种与外部世界无争的生活。那时，这里的深山老箐，不仅盛产史书称“状甚美”的好马，而且大象出没，境内部族政权之间，还有“象兵”参加征战的情况。这儿，高峰刺天，危岩嵯峨，关山险阻，北国群雄，鞭长莫及。对于中原来说，这真是一个神秘而陌生的地方。

秦楚围绕争夺黔中郡，才把目光扫视到了今贵州东部和东北部的局部地方。这可算是贵州最早与中原发生政治军事联系的起点。

此事要从一个带戏剧性的张仪计取黔中郡的历史小插曲说起。

黔中地处于今川鄂湘黔接壤地带，战国时先属楚，后入秦。秦楚都曾在此地设置黔中郡，辖境相当于今湖南沅水、澧水流域，湖北清江流域，四川黔江流域和贵州东北一部分地方。

黔中郡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是因秦灭蜀、巴而凸现出来的。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一个局部地区的位置重要与否，总是与一定时期全局形势发展和周边变化相关联的。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攻灭蜀与巴之后，陈兵川中，楚国西部边境完全暴露在强秦兵锋面前。在这形势下，位于楚国西部的黔中地，就成为楚国西拒秦兵必守之地。而秦国的目标也不仅限于巴蜀。秦将司马错就曾说过：有了巴蜀作为前进基地，就可“浮大船舶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由于整个大格局发生这种变化，一直躲在西南一隅的今贵州部分

地区，才纳入了中原大国的视线之内；尽管黔东北这一隅在黔中郡并不占主要地位，但总算开始成为全国政治军事角逐的目标之一了。

张仪的故事就发生在秦灭巴蜀后5年。公元前311年，秦王派使者对楚怀王说，要以武关之外地方换取黔中地。听起来这是以地易地，其实是威胁。武关在什么地方？它是在陕西丹凤东南部，公元前299年秦昭襄王诱楚怀王会于此，执以入秦。可见，武关是一个要地。它离楚国中心区较远，秦国怎么可能让楚国在自己身边安一块“飞地”？！楚怀王当然不能屈从秦国的威胁，便提出：“不愿易地，愿得张仪而献黔中地。”我们知道，张仪是以“连横”对付苏秦“合纵”的战国时赫赫有名的外交家，搞穿梭外交，游说各国事秦，当上了秦相。楚王料想秦王一定不会把张仪让给楚国。不料，张仪听到这个消息，却向秦王主动请行。秦王很觉奇怪，问道：“楚将甘心于子，奈何行？”张仪答：“秦强楚弱，大王在，楚不敢取臣。且臣善其嬖臣靳尚，靳尚事幸姬郑袖，袖之言，楚王无不听者。”原来，张仪在楚国有内线，他的好友靳尚是楚王宠信的臣子，而靳尚又和楚王的爱姬郑袖有交情。所以，张仪心中有数，知道去楚不会有危险。张仪到了楚国，楚王把他囚禁起来，声称要杀他。靳尚见此情况，果然找郑袖说：“秦王甚爱张仪，将以上庸六县及美女赎之。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贵。”言下之意就是夫人您要被冷落。郑袖听后，日夜向楚王泣诉，说张仪作为人臣是各为其主，你如果杀了他，秦必大怒，楚国就很危险。为了避免日后受秦兵鱼肉，不如趁早把我郑袖母子迁到江南安全地方去。楚王被郑袖的枕边风吹动，把张仪放了，还赠以厚礼。张仪见机便向楚王说了一大套道理：“夫为从者，无以异于驱群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今王不事秦，秦劫韩魏而攻楚，则楚危矣。秦西有巴、蜀，治船积粟，浮岷江而下……则从境以东尽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举兵出武关，则北地

绝。秦兵之攻楚也，危难在三月之内；而楚待诸侯之救，在半岁之外。夫待弱国之救，忘强秦之祸，此臣所为大王患也。大王诚能听臣，臣请令秦楚长为兄弟之国，无相攻伐”（见《资治通鉴》卷第三）。楚王终被张仪说服了，同意把黔中地献秦。

这是一场机智的外交斗争。含贵州东北部在内的黔中地成为这场外交斗争的筹码，张仪斗赢了。

此后，秦楚围绕黔中地的争夺，前后还经历了三十多年，黔中曾数易其手。这期间，楚国为了策应正面拒秦，遣将军庄蹻，向黔中以西，通过今贵州境内入滇。后来，秦再夺黔中郡，道路阻塞不通，庄蹻才留滇建国，自称滇王。这便是古代史上有名的“庄蹻入滇”。

张仪比起黔中地，孰轻孰重，当时为什么拿黔中地换张仪？此事煞费思量，好像有点玄乎。其实，这不过是战国剧烈兼并战争大舞台中的一则小故事。重要的是，这个故事却透出一个信号：随着中原大国政治军事力量向西南扩展，随着大一统的中央帝国呼之欲出，不管多么偏远的地方，也会逐步纳入全国大棋局之中。以贵州而言，尽管在初期，这块地方在秦楚争雄大棋局中，还不算是重要的一只棋子，但封闭千古的高原与全国主流文化的政治军事联系的历史大幕，从此也慢慢拉开了。



盘县大洞旧石器时代古人类遗址

秦始皇开五尺道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雄心勃勃地致力于大一统事业。他的注意力主要是放在对付北方匈奴和经略南越。至于今贵州这个西南荒陬，还未顾及多少。虽然“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但在秦始皇的政治军事天平上，它是占不了多大分量的。然而，秦始皇毕竟还是做了一件开发贵州的首创性的事，这便是修筑五尺道，把巴、蜀与其微外的今川滇黔接壤地区连了起来。

《史记·西南夷列传》对此写下了极其吝啬的两句话：“秦时常嫪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修了路，随之派去了官吏，说明修路与实现政治统治攸关。这便揭开了贵州纳入中央王朝统治体制的一页。

从先秦时期中央王朝的视角看，贵州实在太边远。据我国最早的一部地理著作《禹贡》划分，中国疆土以王畿为中心，以五百里逐级向四方扩展，分为“五服”，其名称是：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有个说法是“惟尔贵州，远在要荒”，就是指贵州属于最边远的要服和荒服之区。其实，贵州这块土地是古人类起源地之一，先秦时已有相当规模和水平的部族政权。司马迁引述过“夜郎与汉孰大”，后世变成“夜郎自大”，流传千古，并且歪曲了史实。其实，司马迁首先是说更重要的一句话：“夜郎最大”。而这句话却远不如“夜郎自大”流布久远。原因大约是这个夜郎尽管在西南夷中“最大”，可是远离华夏古文明中心，处于万山丛中，与外界隔绝。比起中原那些称雄称霸的大国，夜郎古国太寂寞了。秦始皇建国伊始，万端待兴，即决策修一条五尺道通夜郎，应该承认他是有较长远而全面的战略眼光的。这样终于在贵州

高原上空响起了中国有史以来开发贵州的第一声春雷。

五尺道是一条什么样的古道?《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五尺道在郎州。颜师古云其处险,故道才广五尺。”郎州是五尺道的终点,即今云南曲靖。秦修五尺道是以巴蜀为基地,起于今川南宜宾,经高县、拱县、筠连,入云南境过盐津、大关、彝良、昭通,又入贵州境过赫章、威宁,再入云南宣威到达曲靖。这一带地处乌蒙山区,地势险峻,修路工程艰苦异常。据史载,多采取“积薪焚石,浇水爆破”使岩石炸裂的办法凿石开路。至今个别落后地方开山取石还保留此法。五尺道开出的路面极窄,只容单人单骑通过。古人在技术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开发云贵高原,其惊人毅力与决心真令人感动。虽说路宽仅五尺,只是从黔西北边壤擦肩而过,也总算使封闭的贵州有了一条沟通外界的官修小小动脉了。五尺道全路并未全部完工,但在秦汉时,运兵运粮还是发挥作用的。隋代为了统一云南也曾利用这条古道。

开了五尺道,随之而来的是逐步“置吏”,置吏就是纳入郡县制。从史志有关记载看,秦王朝随着五尺道的开辟,在今贵州境内设置了几个县,涉及今贵州相当广阔一片地区。由于五尺道的开辟,夜郎等西南夷地区与巴、蜀的贸易较前频繁。汉初虽然关闭了巴、蜀靠西南夷的关徼,但民间往来没有停止。《史记》载“巴蜀民或商贾窃出,取其笮马、犍牛、髦牛,以此巴蜀殷富。”这说明巴蜀经济发展与五尺道也有关系。巴蜀商贾用以交换西南夷物产和奴隶劳力的商品,主要是铁器,这当然有利于西南夷的农业发展。还有巴蜀的“山林、竹木、蔬食、果实”等产品,也贩入夜郎一带。同时也有一部分内地人口因戍守和开边而滞留夜郎,成为最早的汉移民,给夜郎带来了中原先进技术文化。所以,秦修五尺道,对贵州的开发,是起了多方面积极作用的。